

## 四川大學國立化進程的個案研究評介

• 張仲民



王東傑：《國家與學術的地方互動：四川大學國立化進程（1925-1939）》（北京：三聯書店，2005）。

在當代的人類學研究中，「地方性知識」(local knowledge) 和「地方感」(sense of place) 早已成為人類學家、歷史人類學家甚至是歷史學家的關注焦點。從人類學角度來看，「地點」(locale) 是由許多網絡交匯和作用而形成的結構中的一點，

受更大範圍網絡的影響，而同時又反作用於整個網絡，大的層次和結構都是建基於一個個「地點」的基礎上。因此，對一特定地點進行蹲點和個案考索，不僅能比較透徹地考察與詮釋地方問題，還可以為更大範圍內的問題和變化提供參照、經驗與問題意識，回應或比對更為宏觀的層次及其他地方的知識與類似問題。推而言之，一個國家的歷史是由各個地方的小歷史構成，地方性的和地點性的歷史研究同樣有利於認識和理解更為宏觀的國家層面上的歷史。從這種意義上說，民國時期偏處西南的四川大學，也是一個區域性與地方性相混合的「地點」，其經驗與問題同樣有不可忽略和取代的價值——當時的川大是如何與外部、本地進行溝通、互動和整合(地點與地方、與全國的關係)，國家和地方又是如何反映於川大的運作和表達等等情況，同樣值得後世史家對之進行「厚重描述」(thick description)！

遺憾的是，就近代中國的大學校史研究來說，既有的成果雖然為數甚夥，但目前還鮮見有把近代中

近代中國大學校史研究，鮮有把近代中國大學放在當時的政治和社會的脈絡中，從社會和人類學的視角來考察其內部的運作與外部社會互動的研究。絕大多數研究都是從政治史或政治思想史的視角出發，忽視了大學本有的特殊性和多面向性，這樣寫出來的大學校史無非就是縮小了的中國近代政治史、學生運動史或國共鬥爭史。

一所大學的歷史值得描述的，決不只是其過去的輝煌和「革命事迹」，大學校史的書寫應該包含形形色色的記憶，不能為了因應「當下主義」的需要，就對過去的校史或踵事增華，或「瘦身」或「腰斬」；同時大學還有其作為超出大學之外的意義，一所大學的歷史、一所大學的時空轉換往往包孕着豐富的信息和魅力。

國大學放在當時的政治和社會的脈絡中——把其作為一種制度安排、一個「地點」，從社會學和人類學的視角來考察其內部的運作與外部社會互動的研究。絕大多數研究都是從政治史或政治思想史的視角出發，忽視了大學本有的特殊性和多面向性，這樣寫出來的大學校史無非就是縮小了的中國近代政治史（革命史）、學生運動史或國共鬥爭史。而要比較具象與深刻地認識和理解近代中國的大學史，提倡超越於教育史和政治史、革命史的範疇——特別是從社會史及人類學的視野來研究大學的校史就很有必要。這樣做不僅可以在理論上，也可以從社會實踐上更好說明大學在近代中國的知識、思想和意識形態的生產及其合法化方面的重要意義，也對讀者了解近代中國的國家建構及在建構過程中大學表現出的抵抗和參與，以及隨之而來的學科規訓、思想政治教育等方面都很有意義。近年來，區別於傳統的教育史研究，以蘇雲峰和陳平原為代表所做的大學校史研究，側重於從文化史、學術史和思想史的角度來考察清華和北大的校史，成就斐然。另外，台灣學者王健文所主張的大學校史書寫理念，亦值得注意。

相比於清華大學、北京大學這類民國時期有着輝煌成就與歷史的中心大學，具有濃厚地方特徵的四川大學自然要遜色很多，但一所大學的歷史值得描述的，決不只是其過去的輝煌和「革命事迹」，大學校史的書寫應該包含形形色色的記憶，不能為了因應「當下主義」(presentism) 的需要，就對過去的

校史或踵事增華，或「瘦身」或「腰斬」；同時大學還有其作為超出大學之外的意義，一所大學的歷史、一所大學的時空轉換往往包孕着豐富的信息和魅力。作為一部大學的歷史，王東傑的《國家與學術的地方互動：四川大學國立化進程(1925-1939)》(下引此書只註頁碼)一書在這方面為我們做出了很好的證明。

該書將問題意識集中於四川大學的國立化進程，把「地點」——四川大學置放於更廣闊的文化、社會和政治脈絡下來看待——川大的國立化進程是20、30年代國家統一運動的一部分，通過展示中央、地方和學術界在一個特定場域內圍繞着「國家」這一深具象徵意義的符號所產生的權力糾葛及其演變過程，從多元的角度展現了中國近代的國家建構與國家統一運動如何在一所地方大學中實現的過程。同時該書也描繪出了當時四川地方的社會心態和四川大學國立化進程中所夾雜着的方方面面的人事糾葛——「政治勢力、黨派鬥爭、思想取向，甚至人際關係這些或重大或平凡的因素，都在大學的發展過程中起到過不可忽視的作用」(頁11)，這也提醒我們對「國家建設」(state-building, state-making) 理論在近代中國的適應性須要作出更深入的研究。同時，大學本是學術和教育機構，身處中央與地方勢力之間的知識界對二者的回應，使相關話題突破了狹義的政治論域，可以揭示出當時學術和政治之間的微妙互動關係。

四川大學的國立化進程大體可分為三個時期：一、1935年以前。

此時四川政治為中央政府的實際控制能力所不及，處於半獨立狀態。因此，學校雖名國立，但在實際運作中，國立川大仍為地方性的大學；但在形式上，其「國立」的象徵性名義又往往把川大捲入地方的政潮中，這也很可以顯示出「地方因素」在國立學校生活中的實際作用。總體來看，這一時期，川大為求生存不得不利用各方勢力及其影響力，動用中央和地方、國家與社會的多重資源來達到自我保護的目的。因此，積極尋求中央的支持，是此時四川大學國立化的基本特徵。

二、1935年到抗戰爆發初期，這是川大國立化過程的轉折點。1935年，中央勢力進入四川，教育部也開始整頓川大，對川大進行院系調整和採取了更換校長人選等措施。「這些地方『中央化』的政策是要把中央的力量落實到四川地方上去，這給川大帶來了一個轉機。這是川大『國立化』過程的一個轉折點。」(頁140)在中央政府的極力支持下，兩位校長任鴻雋和張頤大力推進國立化，一方面使川大從地方力量的束縛下解脫出來，另一方面也着力消除學校在政治以外的地方色彩。而中央則將「國立化」視為權力擴張的一部分，這又使川大的國立化帶上了中央化色彩。因而，川大此一時期的國立化進程，夾雜着中央政府與地方實力派關於統一的牴牾以及川大內部的複雜人事糾葛。而因《川行瑣記》事件而導致四川社會對任鴻雋夫人陳衡哲的聲討乃至任鴻雋最終辭職的事件，更顯示了當時各方勢力與派別不同的認同、心態與立場，這些都「既從一個側面

反映出其時中央政府與地方實力當局的權力配置和競爭情形，也暴露出『國家』和『中央』之間『和而不同』式的關係及其實際效應」(頁224)。

三、隨着抗戰爆發和國民政府西遷重慶造成的四川地位上升，川大的國立化基本完成，一躍跨入當時中國實力最強的國立大學行列。但隨着中央在四川的影響力加強和國民黨對教育活動的介入漸多，川大師生與以往曾經多次借助的「中央」勢力發生了齟齬，抗拒教育部任命程天放為校長就是這個矛盾的大爆發。「拒程」運動的參與主體主要是川大教師，其目的在於抵制教育部長陳立夫所推行的黨化教育政策，他們認為「國立化」不必就是「中央化」，更不必是「黨化」，這次運動雖是以學術獨立和學術自由為追求目標，但其間「夾雜着道勢之爭、黨派之爭、地域之爭」等多方面的利益與平衡。經過各方勢力的折衝樽俎，最終還是程天放經過些許妥協後接任校長，「拒程」運動歸於消歇。程在任期間，一方面鞏固個人根基，消弭反對力量，安撫地方勢力，實施黨化主義教育；另一方面也繼續推行國立化措施。於是，川大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開始被牢固地掌握在作為「中央」的國民政府手中。

可以看出，在川大國立化進程中，其關鍵主體雖然是四川大學，但在整個過程裏，在各方派別的活動中，四川大學並非總是「主角」，很多時候它不得不俯仰由人，領受着來自中央與地方的擺布和掣肘。實際上，四川大學的國立化進程就是各方勢力相互競逐、妥協的過

隨着抗戰爆發和國民政府西遷重慶造成的四川地位上升，川大的國立化基本完成，一躍跨入當時中國實力最強的國立大學行列。但隨着中央在四川的影響力加強和國民黨對教育活動的介入漸多，川大師生與「中央」勢力發生了齟齬，抗拒教育部任命程天放為校長就是這個矛盾的大爆發。但程最終還是接任校長，川大開始被牢固地掌握在「中央」手中。

對於地方政府來說，國立化更多是為了掌握「國家」這一符號資源，向民眾和其他異己的地方領導人昭示自己地位的合法性；對於當時的國民政府來說，通過國立化，可以改善中央與四川地方當局的關係，加強地方對中央的向心力；而對於四川知識界來說，大學的國立化可以贏得辦學的自主空間和更方便地獲得某些實際利益。

程，國立化雖是其中的主線，但在不同的時間，隨着不同的情勢，對於不同的派別來說，國立化的實際意味與象徵意義並不完全相同。這事實上也反映出時人心中存在着對於「國家」的多重表述與認同：對於地方政府來說，國立化更多是為了掌握「國家」這一符號資源，向民眾和其他異己的地方領導人昭示自己地位的合法性；對於當時的國民政府來說，通過川大的國立化，可以維持國家在形式上的統一，並可以改善中央與四川地方當局的關係，加強地方對中央的向心力，以便於中央乃至國民黨權力向四川更好滲透；而對於四川知識界來說，大學的國立化可以贏得辦學的自主空間和更方便地獲得某些實際利益，還可以「挾天子以令諸侯」，依靠「國立」這個符號資本，更方便地運用國家資源（符號上的和實際的）來對抗四川地方當局不利於川大發展的舉措，以獲得更多的活動空間，當然，校方還可以借助四川地方當局的力量來對抗或影響中央和教育部通過的關於自身的策令、校長人選等。

須要指出的是，本書的研究對象是民國時期的一所大學，作為大學，它的活動當然不止於教學、招生、經費、革命、意識形態的控制和灌輸或國立化等方面，校園文化與學術生產都應該是一所近代大學必要的、甚至是最重要的組成部分。20、30年代的四川大學儘管一直在經歷着國立化進程中的悲歡離合，但它整個的「日常生活」決不會只圍繞此一事件來運轉，因此筆者以為作者對川大這一時期具體的校

園文化和學術研究還缺乏細部刻畫，比如在國立化進程中不同的時期，川大的校園文化與學術研究有哪些重要的改變？如何體現與國家的互動？與同期其他國立大學相比又有哪些共性與個性？儘管書裏對川大學生的抗日宣傳、認同意識、國學研究和農學院的知識推廣等方面有些刻畫，但未免過於概括。

另一個須要指出的是，作者認為川大的國立化進程「經過抗戰初期的努力，川大基本上實現了國立化」（頁298），1943年在黃季陸接掌川大時，「川大已經實現了真正的國立化」（頁300）。這樣的敘述似乎有些突兀和證據不足，因作者的研究到此就戛然而止了，而作者所列出的事例則只是川大與當時其他一些高校的實力對比，這是否就具有足夠的說服力來證明川大真的國立化了呢？在當時國民政府駐川情況下，川大自然有近水樓台先得月的優勢，受到各方面優先的支持與配合，但在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遷離四川的情況下，川大的國立化有沒有退潮或是否繼續受到四川地方勢力的杯葛？川大與其他國立大學的實力對比有沒有發生變化？川大的經費、招生、教師流動與學生擇業等情況有沒有甚麼大變動？川大的意識形態教育、學生內部的黨派鬥爭情況有沒有大的改變？如果作者再對此後一段時間川大的情況做些延伸描繪與比較，或許就能使讀者更深刻了解四川大學的「國立化」、「國家與學術的地方互動」的實際效果了。

綜合來說，在充分搜集和利用資料的基礎上，本書緊密結合不斷

變化的時代語境與地方背景，相當到位地敘述和分析了川大國立化進程中各方勢力的活動和心態，比較豐實地重建了「地點」——川大複雜的國立化進程及相關問題。因此，該書是可以「為學術界研究中國現代大學的『國立化』及與之相關的民族主義、『國家建構』等問題提供一個可供進一步分析的事例，以增進我們對中國現代民族主義運動在多層面上展開的了解」（頁3）。本研究也可以作為透視民國時期國家（中央）、社會與地方（包括社會與文化）、學校與社會、學術與政治、新與舊等

各方勢力如何博弈的「地點」個案，使我們見微知著，更好意識到在近代中國這個有「多個世界」存在的時空裏，存在着或競爭或合作或利用或互不相關的各種表達，也存在着相應的多種實踐，這些表達與實踐體現在多種多樣的場合及論域裏，如果試圖用比較單一的模式和現象、比較單一的分析維度來概括與書寫它們，無疑就會把歷史簡單化、片面化，不利於我們更深刻和多元地認識近代中國大學乃至近代中國的歷史。在筆者看來，這也是王東傑此書最重要的貢獻。

## 激蕩年代的冷眼觀察

### ● 高益民



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  
（北京：三聯書店，2005）。

魯迅先生評《史記》的「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成了史學與文學完美結合的最高境界。其實當今史家治史，因有近代科學範式的約束，多已不得不放棄對文學性的追求；而文學戲劇家筆下的歷史題材，又難以一任史實的限制，所以寧以戲說博人之寵。倒是新聞界動用學者型記者為讀者講歷史

魯迅先生評《史記》的「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成了史學與文學完美結合的最高境界。當今史家治史多已放棄對文學性的追求；而文學戲劇家寧以戲說博人之寵。倒是新聞界動用學者型記者為讀者講歷史故事，卻為兩者的適當兼顧創造了條件。《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正是王芸生講故事的產物。